

台灣法務部調查局度藏 中共檔案及其史料價值

● 林威杰

一 前言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正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眼前。在史學研究上，民國史由「險學」變成「顯學」，而中共黨史也逐漸走向學術化。關於這一點，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談到：「中國大陸的出版品中，有不少是完全沒有經過刪改的原始文件彙集，而這些作品受到實事求是的考證學風影響，更早已經突破過去中共黨史的框框，提出具有挑戰性意味的見解了。」^①

而找尋新史料、新方法，一直是歷史研究者所努力的方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金以林認為：「歷史研究的創新基礎，最主要的一點是發掘新的檔案文獻」，「只有充分掌握史料，才有可能做出有創新、更接近歷史真相的研究成果」^②。「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的上線，則為學界注入新的活水與泉源，給史學研究提供不少幫助。這個平台核心目標是推動與深化中共抗戰史的研究，打破以往僅局限於中方史料的框架^③。

由此可見，中共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一直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史學界的熱門焦點。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共革命的主要對手方，國民黨所保存的相關文獻對於中共黨史建構有極大的重要性。「中統」與「軍統」兩大特務機關是蔣介石用來執行領袖意志的「耳目」與「工具」，其創建目的是為了鞏固領導權威^④。對內用來偵察反對派，如改組派、地方實力派等；對外則打擊一切威脅國民黨統治的組織團體和勢力，打擊共產黨更是核心任務。過往礙於史料的限制，研究相對困難。關於「軍統」的研究，隨着國史館《戴笠史料》的開放，學界已有豐富的成果；目前「中統」檔案藏於台灣法務部調查局特藏室，因調閱資料有其程序，造成材料取得相對有難度。

調查局特藏室所藏檔案包括「中統」不同時期繳獲、搜羅或所呈關於中共的材料，從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以下簡稱「調查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

計局、黨員通訊局(以下簡稱「黨通局」)、內政部調查局，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改組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以至今今天的法務部調查局。這些檔案涵蓋中共發展各時期，且不少已為孤本；加上「中統」的發展與中共「轉變」份子息息相關，因此保留了不少珍貴的中共黨史資料。本文旨在探究台灣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度藏中共檔案的概況及其價值，進而思考在多元史料下的中共黨史研究。

二 調查局度藏中共檔案現況及相關成果

調查局特藏室檔案起迄時間為1919至1974年，內容包括中共中央及地方組織、宣傳、史料、雜誌、國民黨黨務、參考等資料。根據官網顯示：「本局蒐集大陸書報刊資料，目前有圖書9萬餘冊，報紙22種，期刊77種，總計約30萬份(冊)。……資料除由大陸及港澳各地蒐集外，部分係民國38年〔1949〕前之中共原始文件資料，頗為珍貴，對研究中共早期

活動，為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也是本局典藏的一大特色。」^⑤

「新革命史」一詞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的熱潮，南開大學教授李金錚提到：「新革命史是回歸歷史學軌道，堅持樸素的實事求是精神，力圖改進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重視常識、常情、常理並嘗試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⑥打破傳統革命史的束縛、跳脫意識形態的框架，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目標。然而，一手史料取得的困難以及開放程度的有限，一直困擾着相關研究者。在中國大陸典藏的中共原始資料獲取相對困難的情況下，陳永發提到：「我們也不應該放棄理解中國共產革命史歷程的願望，更何況在中共的檔案收藏之外，我們也不是完全一無所憑。」^⑦調查局特藏室檔案本身的特殊性，加上許多是未經過刪改的一手材料，相信能給研究者提供一定程度的幫助。

1927年4月蔣介石實行「清黨」，中共自此轉入地下活動。國民政府對中共各根據地實施軍事圍剿，使得蘇區承受不少壓力，同時在戰略轉移過



台灣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圖片)

程中，不少中共文件在撤退時來不及銷毀，遭到國民黨繳獲。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中共紅軍未能取得勝利，於是展開長征。隨着紅軍戰鬥愈趨頻繁，中共中央下令部隊輕裝作戰，同時又要求「嚴格檢查行李文件擔數，非經批准不得超過規定數目」。經過長途跋涉和行軍打仗的惡劣環境，導致抵達陝北之初中共中央等相關部門檔案僅五十餘斤，約數千件^⑧。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曾參觀過「中統」與陳誠所藏中共檔案的資料室，讓他驚訝不已，同時感歎「許多資料中共喪失殆盡」^⑨。

不過這些檔案命運多舛，在抗戰期間曾運到貴陽保存，但不幸遭受日機轟炸而損失部分^⑩。戰後又因國共內戰，黨通局將這批材料整理匯裝五十六箱，由南京運到廣州。1949年夏，又運抵台灣基隆，「這批珍貴資料竟露天堆放在基隆碼頭上，任其風吹雨淋，達數月之久，損失多少無法估計」^⑪。1953年，時任調查局局長季源溥因感到運抵台灣的資料、文件、圖書等，係過去同志用血汗生命所換得，實屬不易，因此選址台北縣新店市青潭成立專門單位管理這批材料，稱「蒼蘆資料室」（後改稱「特藏室」）^⑫。至此，「蒼蘆資料室」與「大溪檔案室」、「石叟資料室」並稱台灣三大中共黨史資料研究室。高華曾說到：「一般認為，『蒼蘆』是台灣地區收藏有關中共歷史資料最豐富的單位。該處收有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70年代的經過初步整理的大量的中共原始資料。」^⑬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關於中共組織結構與功能等原始文件，這些收藏包括尚未出版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決策以及各級黨組織之間的通訊文件^⑭。

1964年，當時主持蒼蘆資料室的萬亞剛等人，將中共原始史料編成《共匪禍國史料彙編》三冊^⑮，收入不少調查局所藏的中共檔案。不過礙於成書時代較早，此套彙編僅在小範圍流通，同時在書的封面加註「極機密」。第一冊內容為聯俄容共時期的中共原始資料；第二冊為中共根據地時期資料；第三冊則為中共抗戰階段資料。《共匪禍國史料彙編》披露不少第一手珍貴資料，為學界研究國共早期活動提供極大的助益。

1965年，台灣政治大學教授王健民出版了費時六年成書的《中國共產黨史稿》，此書將中共分為上海、江西與延安時期三個階段。全書二百餘萬字，開創台灣中共通史撰述的先河。作者在〈自序〉提到：「中共的許多歷史資料是秘密的，政府方面所破獲和蒐集的當然不能完備。中共在上海時期（1919-1927）及延安時期（1937-1949）的歷史資料，中國調查機關（現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所蒐集者甚為豐富。」不僅如此，他還獲時任副總統陳誠的允許，前往北投石叟資料室抄閱檔案，這讓他自豪地稱：「我這兩百萬字的中國共產黨史也有可取的地方。直到現在為止，世界上似乎還沒有比我的這本書更完備的中共史」；「波多野乾一曾來台灣參閱蒼蘆和石叟室的資料，使他驚歎不已」^⑯。

1969年，郭華倫出版的《中共史論》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⑰，主要原因係作者披露不少關於中共的珍貴材料，而這是在資訊受到管制的時代所難得一見的。郭華倫本名郭潛，抗戰時期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部長，後被捕「叛變」並加入「中統」。他的「轉變」被「中統」視為抗戰時期最重要的戰果。爾後隨着國民黨在國

共內戰中失利，郭華倫到了台灣協助政府穩定政局。同時為了不讓保密局（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負責情報保防工作）專美於前，郭華倫率領調查局破獲「重整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下詳），其後任調查局副局長、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副主任等職務。

在卸任調查局副局長以後，郭華倫專心學術研究，《中共史論》則為他確立了台灣中共黨史界的地位。作者在書中化名「陳然」，以第三人稱方式闡述中共黨史中的事件，例如在自首共產黨人的問題上提到：「據陳然先生說：1936年以前，中共的白區組織幾乎全被國民黨破壞，絕大多數共黨白區工作幹部被關在反省院反省，中共中央為了救這批幹部並為開展邇後白區工作着想，故有准許假投降自首並寫反共啟事出獄的決定。」作者引用中共閩粵贛省委發出的文件〈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來解釋這些人的「假自首」是「組織決定」；文件以附錄的形式全文列於章節後面^⑱。前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在書的序言提到：「本書採用的史料豐富而廣博，為中外類此書刊所不及，自由中國最可貴的中共黨史資料，如青潭的蒼蘆，北投的石叟室以及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會所藏第一手資料。」^⑲

1980至1990年代陳永發的《製造革命：華東和華中的共產運動，1937-1945》（*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⑳和《延安的陰影》^㉑分別大量引用大量調查局特藏室檔案。楊奎松這樣評論《製造革命》一書：「該書徵引及參考資料多達650餘種，直接參考今人的研究成

果僅80餘種，80%以上的資料是其他人很少利用，甚至是作者獨自發掘的第一手的歷史文獻資料或回憶資料。」至於《延安的陰影》，楊則提到：「有近60%的資料還是作者首次深入研究和利用的。因此，該書的新意，明顯地也還是建立在作者發掘和掌握的相當數量的新資料的基礎上的。」^㉒

上述論著是台灣學界運用調查局皮藏中共檔案完成的代表性成果。除此之外，調查局基於工作與任務需求，本身也對中國大陸以及共產黨問題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例如調查局刊物《共黨問題研究》（後改名為《展望與探索》）定期發表所藏史料，包括調查科編《共黨互際會之調查》^㉓、《共黨內幕及其崩潰》^㉔、《蘇維埃概要》^㉕、《赤匪概要》^㉖、《第三黨專輯》^㉗；廣西省調查統計室編《廣西省調查統計室破獲奸偽經過報告書》^㉘；季源溥的《新新疆建設葛議》^㉙；黨通局綏遠室編擬的《兩年來共匪在綏蒙地區活動概況》等^㉚。這些史料不僅披露中共原始檔案，同時也剖析不同時期「中統」對中共的觀察與研究。除了調查局坐擁這批檔案的寶庫，裏面幹員也利用這些材料發表不少成果，如調查局前幹員張起厚便對共產黨議題頗有研究心得，他整理並發表《中共地下黨時期報刊調查研究（1919-1949）》^㉛，將調查局所藏中共各階段報刊做系統整理，給研究者提供不小幫助。

在資訊封閉的年代與冷戰思維下，西方社會急需對共產黨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調查局皮藏的材料就成為海外認識中國大陸的一個途徑。1950年代任職調查局第四處的曾永

賢指出：「不只是國內，連國外研究大陸問題的學者，也十分重視和珍惜調查局所收藏的資料，不遠千里地前來查閱。當年若要研究中國共產黨問題，無論是歷史或其他領域，全世界都會來薈蘆找資料。日本來的學者最多，再來是美、德等國。」^⑳1976年由三位西方學者發表的《台灣調查局資料室典藏的中共材料》(*Chinese Communist Materials at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rchives, Taiwan*)是海外學界第一次系統介紹薈蘆資料室所藏中共檔案^㉑。

目前申請查閱調查局檔案必須由國內外大學院校、學術機關團體推薦核准，並開具推薦函，經調查局審核通過方可前往。此外，由於檔案資料採取閉架式存放，必須由接待人員協助調閱。萬亞剛就表示：「薈蘆還有一個陋規，最受人詬病，就是那裏的資料，只許抄錄，不准照相或複印，這是世界各國圖書館都沒有的怪規則。」他為此解釋說：「原來國民黨自撤退到台灣後，唯恐國際人士不來捧場，而薈蘆卻是一個吸引外國學者的地方，它要長期引來國際友人，倘准許複印，所有寶藏，一下子被人取走，以後誰還來光顧。」^㉒

三 調查局所藏不同時期的中共檔案

根據筆者長期在調查局查閱檔案，以及有系統地整理所藏檔案書卡的經驗，對館藏有一個基本了解與認識。目前調查局所藏中共檔案大致可分為中共上海與江西時期、陝北時期、抗戰勝利至中共建政，以及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四個時期，其中史料價

值最高的為中共上海與江西時期的檔案，這些多半是當時所繳獲的中共一手材料，不少也是調查科時期的檔案；其次為中共陝北時期，這時期的材料中有許多是中共在邊區所發行的報刊雜誌、公報文件，或是「中統」幹員對中共高層的監視報告，中共內部核心資料較少；再次是抗戰勝利至中共建政階段，這時期礙於國民黨優勢逐漸式微，「中統」很難打入中共內部，材料多半是當時的公開報刊，或是對「民主黨派」、「進步人士」的監視報告等；最後是國府遷台後，這段時期的材料大多是調查局幹員所搜集關於中國大陸的一些情資，但或許是礙於機密原因，筆者無法獲悉，故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加上調查局檔案有不少材料的封面加註「閱後請立即銷毀」之類字樣，這就導致其流通有限，使得日後研究者較難窺探當時的情治分析，殊為遺憾^㉓。以下主要簡介前三個時期檔案的概況。

(一) 上海與江西時期

從1927年「清黨」至1933年中共中央由上海轉入江西蘇區，再到1935年紅軍長征至陝北為止，屬於上海與江西時期。調查局對中共此階段的檔案搜羅頗豐。不過，由於當時「中統」對於檔案不甚重視，因此不僅保存方式有所欠缺，而且囿於整理人員對許多材料認識有限，導致不少檔案封面與內容有所出入。1951年萬亞剛到台灣後，重新主持調查局檔案整理工作，他曾表示：「我再度摩抄每一件經我整理出來的資料，發現若干印象深刻的文物，已不獲重睹了。」^㉔關於這個時期的檔案，又大致可以分為調查科階段所編撰與中共相關的材料，以及繳獲的中共原始文件或抄寫件。

1、調查科編撰材料

1931年的「顧順章案」^⑳，是「中統」發展的歷史關鍵，因為在此後有大批共產黨人「轉變」，這不僅讓「中統」得到質的提升，更能「從此踏進神秘嚴密的共黨地下組織之門」^㉑。調查局皮藏《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卷宗^㉒，便將顧順章案材料集結成冊，包括八筆檔案，分別為〈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份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之發現〉、〈中共國際派陰謀奪取黨內的領導權與羅綺園楊抱安向忠發等被捕〉、〈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之經驗簡述〉、〈關於周恩來謀殺顧順章全家案始末〉、〈富通公司破案紀實〉、〈中央黨員通訊局上海辦事處破獲中共京滬秘密行動縱隊專報〉；內容不僅涵蓋顧順章案，同時包羅黨通局於1947年夏秋之際在上海破獲的「富通公司案」，據檔案指出，「這是中共中央局特務策劃下以合法方式公開營業掩護的最大印刷機構」。黨通局在1949年2月24日破獲「中共京滬行動縱隊案」，檔案內容有黨通局幹員名單、人員部署、案件分析、審訊記錄等資訊，簡述了當時國共鬥爭的激烈。

1931年3月，一位被捕中共黨員在獄中寫下〈四中全會前後共黨分離情形〉，他在開頭便提到：「這是我隨筆寫出來的流水賬」，不過根據內容判斷，此人曾經參與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同時在黨內應有一定的地位。因為文章清楚描述以王明為首的留蘇學生與何孟雄、羅章龍等人之間的紛爭。作者也提到何孟雄曾三次找他談話，並表達對黨內路線的不滿，說明兩人關係匪淺。正因如此，文章對何

孟雄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活動軌迹與心境有較多的闡述。關於六屆四中全會，則提到「王克全、何孟雄、羅章龍、王鳳飛、徐錫根這班搗蛋鬼，到了會場聽到國際代表——米夫報告開會議以後，才明白是開四中擴大會這麼樣的鬼圈套」。因為有「中央特務隊及武裝在那裏鎮壓」，加上「到會的一共有三十多個，何孟雄派僅少數是不成問題的。一個四中而又是擴大的堂堂大會，只草草率率開了八個鐘頭，每人發言，只限定五分鐘，何孟雄的人雖然有許多的牢騷自然也只得嚥在肚子裏」^㉓。六屆四中全會被中共官方認定為「沒有起任何積極性的作用」，「四中全會就成為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佔據統治地位的開端」^㉔。因此，筆者相信這則材料對研究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有所助益。

1933年3月調查科編撰《中國共產黨組織問題》^㉕，則是將中共的黨政軍概況作詳細的分析，包括創黨歷史、組織架構、黨章、各地黨組織與外圍團體，同時也將共產黨如何與群眾互動做了深入探究。例如，提到支部的作用，說明中共如何透過成立支部、培養幹部來發展黨組織。此外，還提到中共內部留蘇派與中國本土派的分歧，以及對秘密工作有清楚的介紹。

1933年調查科編撰《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1931至1933)》^㉖，內容對中共創黨、建軍以及各地蘇維埃根據地的發展有一番介紹。此外，六屆四中全會是中共黨史上重要的轉折點，由於王明等留蘇學生上台，造成黨內的分裂危機，書中也對此次紛爭有一番剖析與闡述。全書對1931至1933年中共的黨政軍、根據地經濟、黨員與團員人數、槍枝數量等均有全面性

的分析，這也意味着此時調查科已對中共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書中最後特別強調調查科反共的成果，尤其突顯「自首自新」政策的成效與反省院的作用^④。

1933年，調查科將「轉變」後共產黨人的自白或宣言編撰成《轉變》一書^⑤，其中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以及顧順章、羅章龍、余飛等三百人的自白、自新宣言材料。《轉變》是研究中共早期黨內忠誠問題的重要參考，我們可以從這些「轉變」份子前後的言行，來觀察與認識他們究竟是信仰發生改變，抑或僅僅只是生命受到威脅才選擇背叛黨、出賣過往同志。

2、中共原始文件、抄寫件

關於調查局所藏的中共原始文件或抄寫件，不少是目前較為罕見或仍未有學者利用的。例如1930年6月27日〈湖北省委給鄂西特委信〉便提到在「爭取一省首先勝利的前途」^⑥，各地方黨部必須全員動員起來。其中還談到要加強青年運動、婦女工作，以及如何過組織生活等問題，為中共早期地方發展提供珍貴材料。1931年1月7日的〈擴大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告在獄中革命戰士書〉^⑦，提到留蘇學生上台，為了強化領導權威，鞏固內部團結，第一步便是向在國民黨獄中的同志傳達會議精神，同時也表示就算這些人遭到國民黨的迫害，黨中央仍記得他們。這也說明當時中共在國民黨監獄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活動，這些被關押的共產黨人並非全然與外界隔絕。對此，王明就曾經向共產國際遠東局表示：「在龍華監獄（專為共產黨人設的軍事監獄）關押着500人，其中300-400人是我們的同志。他們在獄中成立支部。」^⑧

1931年1月23日通過的〈江蘇省委關於黨四中全会的決議〉，材料落款為「C.Y.江蘇省委」，即共青團江蘇省委，首頁則蓋上「中華民國廿年參月廿四日收到」^⑨。這說明其實在顧順章叛變前，調查科早已派人潛入中共內部，或者是中共黨內有「叛徒」。又如王鳳飛在1月26日呈給中共中央的〈反四中全会的意見〉，在首頁同樣蓋有「中華民國五月壹日收到」^⑩。透過這些材料，可見此時調查科對中共已有一定程度的滲透或掌握。為了反制國民黨的來勢洶洶，又鑒於曾有人冒充省委派來人員對地方組織進行內部破壞，1932年1月5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布〈緊急通知——關於秘密工作〉，開始加強各級組織的秘密工作，例如文件規定「各種機關，確定組織關係，不得隨便亂闖」、「來往信件一定要經過組織手續，不得隨便叫人帶走」，等等^⑪。

(二) 陝北時期

抗日戰爭係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折，不僅改變國家發展的走向，同時也讓國共關係有了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歷經國民黨五次圍剿，長征的經歷更成為共產黨歷史的分水嶺，倖存者忠誠地保護這類神話，因為他們知道一旦日本人或國民黨取得歷史的主導權，那麼死去的戰友、同志失去的不止是生命，還有賦予他們生存意義的價值^⑫。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金沖及認為，中共在創黨初期黨員成份很複雜，有的人成為黨的領導人，有的人為革命犧牲，有的人在中間脫離黨，有的成為叛徒，也有一些人組織上入黨、但思想上沒有入黨，甚至會蛻化變質^⑬。因此長征是一次對黨忠誠

的考驗，更是一次篩選；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如唯一參加過長征的台灣人蔡孝乾，他的「叛變」導致日後中共在台灣地下組織的覆滅(下詳)^④。延安整風讓黨在思想上有了統一，組織性也有所加強。基於上述因素，「中統」在這個時期很難打入中共高層。陝北時期的材料較上海與江西時期有所不同，主要是中共在邊區的各種文件、布告，以及各級組織機關雜誌與報刊等，也有「中統」對共產黨重要人物的監視報告或各地組織的調查資料。此外，由於正值對日抗戰，「中統」也着重對日情報的蒐集與漢奸偽政權的活動。

國共兩黨在抗戰初期曾有一段蜜月期，不過在戰事進入僵持階段，同時隨着歐戰的爆發，蘇聯因素逐漸淡出中國戰場，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又重新回到剿共的老路上^⑤。因此，蔣介石命令各地方黨部禁止共產黨活動，「如果有必要，把他們趕出轄地」^⑥。基於這樣的背景以及國共間緊張的態勢，讓「中統」更加積極地對共產黨進行活動。1938年，「中統」曾在國民政府從武漢撤退前後，對中共做過系統的報告〈武漢撤退前後共黨活動之動向〉，對中共193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以及六屆六中全會內容有完整的掌握，也分析了中共在各根據地的黨政軍概況。報告顯示當時中共的軍事戰略是「鞏固與發展八路軍及新四軍之實力，加強陣地戰力之可能，組織機械化部隊應視為其目前軍事上之中心任務」，對國民黨的策略則是「迎上層、打〔中〕層、抓下層」；在統一戰線議題上，報告認為僅是中共「冠冕堂皇之號召耳」^⑦。從中可以清楚地了解此時國民黨對中共的整體策

略，並說明在中共發展實力的問題上，國民黨仍時刻保持着警戒。

此外，1939年「中統」曾抄寫一份關於中共的〈組織工作報告〉，內容講述六屆六中全會後豫鄂皖邊區的組織發展策略。報告在「改變工作方式和保持立場的問題」部分提到：「團結同情者，但不要表現化，用抗日面目出現，用友黨左派力量打擊頑固份子」，「站在共產主義立場了解三民主義，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實行三民主義，以馬列主義的理論充實三民主義」^⑧。從這份報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六屆六中全會後的主要任務是維持統一戰線，避免不必要的衝突進而影響黨的發展。但這也從側面反映此刻國民黨清楚中共整體的發展策略。

1939年初周恩來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皖南雲嶺視察，以緩解國民黨地方黨部與新四軍的緊張態勢，同時受到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紘之邀，「打算到浙江去看看」。但周恩來此番行程受到「中統」的全面監視，並有一完整報告〈中委周恩來來浙經過調查專報〉^⑨，其中將周恩來每日行程、與何人見面、談話內容詳細記錄。相信周恩來也清楚知道，以他的身份必然受到國民黨監控，因此謹言慎行。此時周恩來貴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尚且受到如此對待，可見國共關係的緊張態勢。

當時留在敵後的國民黨部隊，主要由地方保安團和雜散武裝改編而成，質量參差不齊，這樣的隊伍自然無法與訓練有素的日軍抗衡；在與共產黨部隊的競爭中又時常處於下風，這就導致國共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加深。1939年6月，「中統」出版的《新四軍的罪惡調查專報》便說明這樣的

衝突。在地方國民黨部隊的認知中，新四軍不僅「游而不擊」，而且還「到處設卡抽稅，強徵暴斂，破壞役政，補充實力，組織民眾，宣傳赤化，搜繳民間及當地少數部隊槍械，充實武力」^⑩。

1939年底的「新軍事件」便是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與中共矛盾激化的顯著例子^⑪。為此，「中統」專門出版一集《山西「新軍」叛變之真象調查專報》^⑫，將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的組織概況、政治主張以及發展作了一番分析，闡述中共如何利用犧盟會建立武裝，從而逐漸在山西取得實際影響力；內容對新軍實力、領導人狀況有清晰的描述，同時也對新軍與犧盟會控制刊物的政治主張作了系統性分析。

1940年4月28日，「中統」的廣東省調查室將所查獲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材料編成〈東江共黨密件〉，文件談論中共進行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則、具體內容，以及對付敵人的方式。其中提到共產黨人在「以大無畏精神，擁護黨、確定黨『高於一切』」的信念下，在遭到敵人逮捕時，必須「寧死不能告密」，「受毒刑不能吐密」，以此傳承共產黨人「英勇犧牲的精神」^⑬。這則材料成為研究中共抗戰時期黨內忠誠問題的一項重要依據。

1940年「中統」破獲中共閩西南特委機關，並將相關材料編成《破獲奸偽閩西南特委機關重要文件彙編》^⑭。這份文件彙編清楚地顯示，中共認為汪精衛出走後，國民黨一直有投降的傾向，因此最大任務是要防止這種可能的發生。同時提到在皖南的新四軍已遵令北移，其部隊在江北的確調動困難，而非故意抗命。顯然在皖南事

變前，國民黨早已知道在新四軍調動一事上中共方面的難處。

1942年「中統」將工作重心專注在中共的秘密工作，這主要是由於皖南事變後，國共兩黨關係急劇下滑，「自新四軍叛變被解決後，其秘密工作復加倍進行，『隱蔽政策』進行不遺餘力，適來全力發動調查研究工作，亦寓有擴大秘密工作之意」。為了「防止中共之盲動勢力的抬頭，必首先對付其秘密工作之進行」，因而編撰《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將中共秘密工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21至1927年「中共產生至加入本黨〔國民黨〕時期」；第二階段是1927至1936年的「暴動政策時期」；第三階段則是1936至1942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內容對各階段的中共秘密工作有一個完整的研究與分析，進而得出「秘密工作是中共目前活動的命脈，可以說要有秘密才有中共，沒有秘密就沒有中共，中共與秘密簡直是不能分開的」^⑮。

「中統」除了與共產黨作鬥爭外，偵查黨內反對派與地方實力派也是主要任務，例如《關於改組派的總報告》對改組派的調查與滲透做了詳細記錄^⑯，可以還原「中統」特務在黨內的活動歷史，審視「中統」在蔣介石確立國民黨「最高領袖」過程中的作用^⑰。此檔案至今未曾披露，殊為可惜。

（三）抗戰勝利到中共建政

隨着日本戰敗，位居西南大後方的國民政府以及散布各地的中共抗日根據地，開始積極地爭奪抗戰勝利的果實。在打敗日本這個敵人後，兩黨矛盾似乎一觸即發。此刻中共已非吳下阿蒙，而是一個擁有近億人口的「解放區」與百萬軍隊枕戈待旦的政

黨。此時「中統」也將工作重心放在對付中共與那些同情共產黨的人物或團體。1949年5月上海淪陷，黨通局幹員楊培受困上海，他將自己與表兄張達三的對話上呈，編成〈奸匪份子密話錄〉^⑥。張達三在1937年加入中共，屬於縣級幹部（解放軍中屬團旅級）。從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一位中層共產黨員對組織的認同與想法。

此外，台灣在抗戰勝利後也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焦點之一。1946年由蔡孝乾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會」）的創立，便是中共將革命信念移植到台灣的一次嘗試。不過隨着1950年蔡孝乾的「叛變」，間接導致日後省工委會的覆滅，大批共產黨人被捕。在查獲的省工委會文件中，如〈台共省委1950年工作總結〉便是鑒於蔡孝乾被捕後所做的工作檢討。報告提到1950年是省工委會「最艱苦的一年」，是「建黨的轉折點」，是「由『偏於數量』的建黨方式轉入『偏於質量』的建黨方式的年頭」，是「由開關進入鞏固的年頭，而由開花轉入結實的年頭」。基於過去失敗的經驗，省工委會得出「必須嚴守組織原理」、「必須嚴守秘密組織原則」的經驗教訓，必須「進行真正深入隱蔽的群眾工作，保存幹部，累積力量」^⑦。這份報告不僅提到要重視黨員的思想教育，也強調必須加強群眾工作，以避免再有背叛組織的情形。

1952年，由郭華倫率領的調查局更一舉破獲了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是為「重整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至此，「台灣的共產主義活動已被成功鎮壓，除非島內顛覆活動有共產黨對台灣入侵的配合，否則不會嚴重影響國民黨的軍事能力」^⑧。1951年內

政部調查局出版《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⑨，隨後在1952年出版了《破獲匪共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查繳文件集要》^⑩、《台灣地區對匪鬥爭工作總結》^⑪，1954年出版《台灣之政治保衛工作》^⑫，1955年出版《台共叛亂史》^⑬，等等。這些材料成為國民黨當局在制訂對大陸政策時的重要參考依據，不過礙於調查局屬於情治單位，內部文件在流通上有其局限。

四 結語

對上述材料的概述僅為筆者查閱檔案的一些心得，當然調查局皮藏的中共檔案內容遠遠不止如此。歷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透過分析、解讀材料，進而還原事件的原貌。在思考調查局特藏室檔案的價值時，必須清楚每筆材料形成的歷史背景與時代環境；加上特務工作本身的獨特性，在使用上必須秉持嚴謹的態度。這些材料除了有助中共黨史研究的進展外，同時也能讓研究者從側面了解「中統」的組織活動以及不同時期的國共關係。高華提到：「研究中共黨史，若僅從文獻字面加以理解或過份依賴於官方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分析，肯定會造成理解上的誤區。」^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耀煌的《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是作者利用調查局特藏室檔案完成博士論文並在此基礎上修改的專著。作者在〈自序〉中曾提到：「中共黨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深入大量的材料之後，還能夠安然無恙地走出來，不被材料牽着鼻子走。」^⑮陳永發也認為：「敵對方的資料很難排除造假污衊的可能。」^⑯

因此，他所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在史料的引用上顯得相當慎重，多半參考中共原始檔案以及中國大陸出版的各類回憶錄，以此相互印證。

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為了有效控管中共「轉變」份子，將不少人安置在調查局從事共產黨研究，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往往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一門封閉的官方知識，相關研究機構也多半具有「情治單位」的特性，「在反共的氣氛要求政治正確的情勢下，大家的研究的水平沒有提高，研究只是在重複從事低效益的體力勞動而已」^⑩。隨着台灣社會環境的變遷、政治的民主化、本土意識的抬頭，「反攻大陸」一詞也逐漸離開人民的生活，致使對共產黨的討論也不再是敏感的話題，相關研究開始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走向學術化。

近年來，台灣學界開始關注台灣史、社會史、婦女史，乃至於身體史等各個層面，傳統政治史則相對式微。確實，筆者自2016年開始在調查局檔案室有系統地查閱檔案，多數時間僅自己一人，只有少數機會能遇到其他學者。不過慶幸的是，由陳永發牽頭，2018年起中研院近史所與調查局開展合作，計劃將這些檔案進行約15萬頁的數位化掃描，目前已開放1,389冊檔案史料的電子檔，不過仍需到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查閱。期盼在不久的將來，神秘的「蒼蘆檔案」能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註釋

①⑦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43；42。

② 金以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珍稀文獻的收集與開放〉，《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頁8；〈加強檔案數字化建設，催生民國史研究線上轉型〉，《民國檔案》，2020年第3期，頁56。

③ 羅敏：〈「抗戰文獻數據平台」與創新中共抗戰史研究的方向和可能〉，《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2020年12月），頁157-58。

④ 蔣介石：〈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1935年1月1日），載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三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7。

⑤ 參見〈資料簡介〉，法務部調查局網，www.mjib.gov.tw/EditPage/?PageID=85631920-f741-4f90-b196-f645d909e9a2#3。

⑥ 李金錚：〈「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江海學刊》，2018年第3期，頁159。

⑦ 劉英、丁家棟、楊潔：〈長征史料的挖掘、保存〉，《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1期，頁147。

⑧⑩⑬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原名《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冊（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頁5；4；4。

⑪⑭⑯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頁311；313；311。

⑫ 張起厚：《蒼蘆典藏中共地下黨時期各地機關刊圖影輯》（台北：法務部調查局，2011），頁1；《蒼蘆簡介》（台北：法務部調查局，2012），無頁碼。

⑬ 高華：〈台北所藏大陸20世紀50-60年代資料過眼錄〉，《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頁120。

⑭ 孫亞光譯：〈中華民國調查局匪情資料室藏書內容簡介（一）〉，《共黨問題研究》，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頁94。

⑮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撰委員會編：《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一至三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撰委員會，1964）。

- ⑰ 郭華倫：《中共史論》，增訂版，第一至四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3）。
- ⑱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頁196；中共閩粵贛省委：〈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1937年10月15日），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頁212-13。
- ⑲ 吳俊才：〈吳序〉，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5。
- ⑳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㉑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㉒ 楊奎松：《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189-90。
- ㉓ 調查科特務組編：〈共黨互際會之調查〉（1931年），《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9期（2010年9月），頁123-35、第8卷第10期（2010年10月），頁94-109。
- ㉔ 調查科特務組編：〈共黨內幕及其崩潰〉（1931年），《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12期（2010年12月），頁119-28、第9卷第1期（2011年1月），頁107-27。
- ㉕ 調查科特務組編：〈蘇維埃概要〉（1932年），《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3期（2010年3月），頁92-114、第8卷第4期（2010年4月），頁97-118、第8卷第5期（2010年5月），頁95-120。
- ㉖ 調查科特務組編：〈赤匪概要〉（1932年10月7日），《展望與探索》，第10卷第10期（2012年10月），頁97-108、第10卷第12期（2012年12月），頁97-102、第11卷第1期（2013年1月），頁79-96、第11卷第2期（2013年2月），頁93-102、第11卷第4期（2013年4月），頁111-14。
- ㉗ 中央組織會調查科編：〈第三黨專輯〉（1933年8月3日），《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6期（2010年6月），頁96-110、第8卷第8期（2010年8月），頁98-117。
- ㉘ 廣西省調查統計室編：〈廣西省調查統計室破獲奸偽經過報告書〉（1942年9月1日），《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12期（2011年12月），頁97-110、第10卷第1期（2012年1月），頁86-103、第10卷第2期（2012年2月），頁89-102、第10卷第3期（2012年3月），頁83-102、第10卷第5期（2012年5月），頁76-102、第10卷第6期（2012年6月），頁101-110、第10卷第7期（2012年7月），頁104-109、第10卷第8期（2012年8月），頁95-107、第10卷第9期（2012年9月），頁105-110。
- ㉙ 季源溥：〈新新疆建設蒞議〉（1943年5月），《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2期（2011年2月），頁119-32、第9卷第3期（2011年3月），頁122-34。
- ㉚ 黨通局綏遠室編擬：〈兩年來共匪在綏蒙地區活動概況〉（1946年12月10日），《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5期（2011年5月），頁101-18、第9卷第6期（2011年6月），頁105-18、第9卷第8期（2011年8月），頁109-23、第9卷第9期（2011年9月），頁102-11、第9卷第11期（2011年11月），頁91-102。
- ㉛ 張起厚：《中共地下黨時期報刊調查研究（1919-1949）》（台北：永業出版社，1991）。
- ㉜ 曾永賢口述：《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20），頁154。
- ㉝ Peter Donovan, Carl E. Dorris,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Chinese Communist Materials at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rchives, Taiwa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關於調查局藏書目錄，亦可參見孫亞光譯：〈中華民國調查局匪情資料室藏書內容簡介（一）〉，頁94-102；〈中華民國調查局匪情資料室藏書內容簡介（二）〉，《共黨問題研究》，第10卷第2期（1984年2月），頁104-10；〈中華民國調查局匪情資料室藏書內容簡介（三）〉，《共黨問題研究》，第10卷第9期（1984年9月），頁86-97。

⑳ 黃文德：〈法務部調查局特種資料典藏概況〉，《漢學研究通訊》，第37卷第3期(2018年8月)，頁22。

㉑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在武漢遭調查科逮捕，並隨即「轉變」投靠國民政府，協助國民黨打擊共產黨。在他的指導與訓練下，國民黨特務組織得到極大的發展。參見林威杰：〈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國史館館刊》，第68期(2021年6月)，頁95-139。

㉒ 徐恩曾：《我和共黨鬪爭底回憶》(台北：出版單位不詳，1953)，頁19。

㉓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1931-1949年)，法務部調查局，276/7435/59400。

㉔ 這位與會者自稱「小林」，在遭到國民黨逮捕後，他於自白書中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黨內的紛爭有一清楚交代。參見小林：〈四中全會前後共黨分離情形〉(1931年3月)，法務部調查局，260.07/815/12322。

㉕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一卷(1921-1949)》，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頁310。

㉖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問題》(1933年3月12日)，法務部調查局，200.1/739/2747。此時期應屬調查科階段，此編者為後人加上。

㉗ 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1931至1933)》，法務部調查局，270.1/7455/01802 c.1、270/7455/09748-9 c.2-3、270/7455/10693 c.4。

㉘ 為進一步有效打擊中共，國民政府採取鼓勵自首和發表反共宣言的政策，凡是自首者，不再輕易使用肉體懲罰和殺戮的辦法；而反省院則是處置這些被捕或自首共產黨人的一種「教育機構」。參見「共產黨人自首法」(1928年10月15日)，〈共黨處理辦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28-001。

㉙ 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法務部調查局，245.3/841/14824。

㉚ 湖北省委編：〈湖北省委給鄂西特委信〉(1930年6月27日)，法務部調查局，255.35/812/9164。

㉛ 中共中央編：〈擴大的中共中央四中全會告在獄革命戰士書〉(1931年1月7日)，法務部調查局，255.25/804/11830。

㉜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陳紹禹談話紀錄〉(1931年2月4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十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頁37。

㉝ 中共江蘇省委編：〈江蘇省委關於黨四中全會的決議〉(1931年1月23日)，法務部調查局，255.31/80612470。編者出自檔案封面原文，與檔案內容落款者有出入，是後人整理加上的。

㉞ 王鳳飛：〈反四中全會的意見〉(1931年1月26日)，法務部調查局，262.3/23/14902。

㉟ C.Y. 江蘇省委編：〈緊急通知——關於秘密工作〉(1932年1月5日)，法務部調查局，255.34/806/9270。編者出自檔案封面原文，與檔案內容落款者有出入，是後人整理加上的。

㊱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關於中國革命的十個議題〉，載董玥主編：《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99。

㊲ 金沖及：〈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有三個全新特點〉，《北京日報》，2021年1月11日，第10版。

㊳ 參見林威杰：〈共產黨人的道路抉擇：蔡孝乾的「叛變」與轉變〉，《東吳歷史學報》，第41期(2021年12月)，頁91-139。

㊴ 羅敏：〈抗戰前期蔣介石對中共態度的演變——基於國際背景因素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3期，頁31。

㊵ 〈鄧發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39年3月27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第

十八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0),頁117。

②⑦ 中央調查統計局:〈武漢撤退前後共黨活動之動向〉(1938年),法務部調查局,270.9/7435f/66407。

②⑧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組織工作報告〉(1939年),法務部調查局,270/815/3784。

②⑨ 浙江省調統室編:〈中中中委周恩來浙經過調查專報〉(1939年3月),法務部調查局,272/810/2098。關於這份材料,1998年曾由浙江省檔案館將館藏抄件整理發表,以紀念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參見浙江省檔案館:〈中中中委周恩來浙經過〉,《浙江檔案》,第3期(1998年3月),頁18-20。

③⑩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新四軍的罪惡調查專報》(1939年6月),法務部調查局,275.5985/7400/5881。

③⑪ 1936年秋,閻錫山與中共合作發起「犧牲救國同盟會」,以組織群眾進行游擊戰。然而,犧盟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中共的實際掌握,其所屬武力自稱為「新軍」,以區別於閻錫山既有之「舊軍」。1939年11月底,在國民政府冬季攻勢初期,由閻錫山負責的第二戰區針對日軍在晉南地區作戰。期間,犧盟會成員韓鈞因不滿閻錫山企圖將犧盟會主導權收回,便將「舊軍」軍官殺害,進而引發一連串新軍「叛變」,是為「新軍事件」。此事件導致山西局部抗日軍事進展遭受阻礙。

③⑫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山西「新軍」叛變之真象調查專報》(1940年),法務部調查局,270/815/4130。

③⑬ 廣東省調查室編:〈東江共黨密件〉(1940年4月28日),法務部調查局,276/814/7337。

③⑭ 中央調查統計局:《破獲奸偽閩西南特委機關重要文件彙編》(1940年),法務部調查局,276/815/8276。

③⑮ 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276.1/815/10822。

③⑯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關於改組派的總報告》(1932年),法務部調查局,165.7/815/022877 v.1-3。

③⑰ 參見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的確立》,修訂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③⑱ 楊培:〈奸匪份子密話錄〉(1949年11月16日),法務部調查局,276.1/470/12016。

③⑲ 台共省委:〈台共省委1950年工作總結〉,法務部調查局,257.4/7451/65908。

④⑰ 〈中情局關於台灣國民黨政權今後實際反攻能力及對美國助國民黨反攻大陸計劃的可能反應之評估〉(1952年6月12日以後),載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四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8),頁193。

④⑱ 內政部調查局編:《共匪的特務工作與保密工作》(1951年11月),法務部調查局,276/725/19121 c.4。

④⑲ 內政部調查局編:《破獲匪共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查繳文件集要》(1952年),法務部調查局,232.1137/7135/65316。

④⑳ 內政部調查局編:《台灣地區對匪鬥爭工作總結》(1952年),法務部調查局,270.9/7135a/65904。

④㉑ 內政部調查局編:《台灣之政治保衛工作》(1954年),法務部調查局,276/7135/64509。

④㉒ 內政部調查局編:《台共叛亂史》(1955年),法務部調查局,232.223209/725/40541-5/c.1-5。

④㉓ 高華:〈在史料的叢林中——讀陳永發新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9年6月號,頁120。

④㉔ 陳耀煌:〈自序〉,載《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IV。

④㉕ 陳永發:〈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紀》,2018年8月號,頁44。

④㉖ 楊開煌:〈「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第11期(2000年9月),頁70。